

# 张律电影中的伦理身份研究\*

——以《春梦》为例

王嘉玮\*\*

## 目 录

1. 绪论
2. 伦理身份的理论基础与分析视角
3. 《春梦》中核心人物的伦理身份建构
  - 1) 艺璃：责任承担与伦理身份的形成
  - 2) 益准、庭凡、钟彬、珠英：边缘人物的伦理回应与身份边界
4. 《春梦》中伦理身份关系的影像呈现
  - 1) 沉默与画面镜头中的伦理在场
  - 2) 画面色彩及空间构图中的伦理位置
5. 结论

## 中文摘要

本文以张律导演电影《春梦》为研究对象，在梳理中韩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身份”概念，尝试突破既有研究主要从族裔身份、流散经验、跨国文化与身份认同等角度阐释张律电影的路径，将分析重心转向人物在具体关系实践中的伦理位置生成。本文认为，电影《春梦》中的人物并非通过明确的身份宣言、情节性转折或制度性确认来确立自我位置，而是在沉默、陪伴、照料、克制与责任承担等日常行动中，逐步生成一种稳定却未被明确命名的伦理身份。本文从人物关系与影像表达两个层面展开分析：一方面考察艺璃、益准、庭凡、钟彬与珠英如何在边缘处

\* 本论文在第14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上进行发表后修改投稿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글로벌문화콘텐츠학과 박사생

境中完成伦理回应与身份建构；另一方面分析黑白摄影、长镜头、静态镜头、空镜头与空间构图如何使伦理关系获得可视化呈现。本文认为，电影《春梦》通过去戏剧化的叙事策略与节制的影像语言，将伦理从价值判断转化为一种持续存在的关系状态，不仅展现了边缘人物在跨国流动背景下的伦理生存样态，也为理解张律电影中的人物建构与影像伦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张律电影；《春梦》；伦理身份；文学伦理学批评；边缘人物；影像叙事；身份建构

## 1. 绪论

随着当代社会全球迁徙的加剧与文化边界的日益模糊，身处异地、漂浮不定的个体逐渐成为电影叙事中频繁出现的重要人物。他们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承受文化、语言与情感的多重隔阂，其身份不再由国籍、族群等传统分类所决定，而是在与他者持续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塑形。全球迁徙与文化边界的流动，使身份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并在多元化与碎片化语境中呈现出焦虑与不确定性。<sup>1)</sup>在这一背景下，身份不再只是静态的社会标签，而是能够被个人或集体拥有、确认或丧失的实质性属性，并“为塑造和框定有关自我、他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历史关注提供了新方式”。<sup>2)</sup>因此，身份也应被放回具体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中理解，其形成过程本身与人的行为规范、价值判断和责任承担密切相关。<sup>3)</sup>张律作为一位出生于中国、在中韩两地发展并长期聚焦边境与流动主题的导演，其作品深刻揭示了这些边缘个体的处境，尤其关注他们如何在异地生活中面对孤独、冲突、欲望与死亡。在他的电影中，这些人物既是社会秩序之外的旁观者，也是伦理关系中的回应者。他们通过非线性叙事与非戏

1) 窦立春，身份的伦理认同，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16。

2) 玛丽·莫兰，宁艺阳，陈后亮译，〈身份和身份政治：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19，36页。

3) 向玉乔，卢明涛，〈论身份伦理〉，《伦理学研究》第四期，2023，28-36页。

剧化呈现，在日常交往中不断重新界定“自我”的位置与意义。

本文选取张律导演的电影《春梦》（2016）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影片围绕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女性艺璃展开：她为寻找父亲来到韩国，却在父亲瘫痪后留在当地，一边经营“故乡酒馆”，一边承担照料责任。围绕艺璃展开日常生活的益准、庭凡与钟彬，也分别处于无业、脱北、疾病与家庭边缘等不同处境之中。三人都对艺璃产生情感依赖，而艺璃始终以沉默、克制与陪伴维系彼此之间微妙的伦理关系。由此，影片并未通过强烈情节冲突呈现身份转变，而是在日常共处中展现边缘人物伦理位置的生成。

影片通过多重边缘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淡化戏剧冲突，强化情感张力，使得人物身份的形成不再依赖语言或制度，而是在沉默、陪伴、责任、克制中自然浮现。这一过程，正是“伦理身份”生成的动态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sup>4)</sup>，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同时“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sup>5)</sup>因此，《春梦》不仅是异乡人与边缘人的生存写照，更是一则关于伦理回应与身份建构的伦理叙事。相较于传统从族群、文化或政治身份出发的“身份认同”研究途径，本文更关注伦理关系中的主体生成，即人物如何在责任担当、他者回应、情感克制与在场行动中伦理化地为一个道德存在者。在张律电影中，人物往往不通过明确宣言或戏剧性选择来呈现身份，而是在日常交往、沉默陪伴与微小行为中不断生成。边缘人物寄望于寻找同类，获得“群体认同感”并重建其伦理关系，这也是强调的“同类最知音”。<sup>6)</sup>这些人物既共享被主流社会排除的境遇，又在彼此关系中进行着微妙的回应、试探与连结，其伦理身份由此逐步浮现。因此本文在与既有从族群身份、跨国流动或文化政治角度研究张律电影的研究路径不同，并不将影片《春梦》中人物的身份理解为预设的社会标签或文

4)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6页。（pdf版本）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4页。

6) 陈芊含，汪云霞，〈伦理选择与文化身份认同—《汉尼拔》小说与影视的文本对比研究〉，《社会科学动态》第四期，2024，109-114页。

化归属，而是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身份”概念，关注人物如何在具体关系与责任回应中生成其主体位置。

综合韩国RISS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有关张律电影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中韩学界已从离散经验、跨国文化、城市空间、女性身体与影像诗学等多个维度，对其电影文本展开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这些研究有效揭示了张律电影中少数民族群的生存处境、空间政治结构以及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构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谱系。然而，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多将人物理解为被族裔身份、流散经验或社会结构所规定的“身份主体”，关注其身份焦虑、认同困境或文化位置的变迁过程，而相对较少进一步追问：当人物长期处于身份悬置与社会边缘状态时，他们如何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通过行动、回应与责任承担，作为伦理主体存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引入“伦理身份”这一概念，将分析重点从身份归属与认同完成，转向人物在日常交往与关系实践中的伦理位置生成。以电影《春梦》为例，本文关注在以族裔身份与流散经验为叙事背景的张律电影中，伦理身份如何通过沉默、陪伴与持续的责任承担得以呈现，从而补充现有研究中对人物伦理存在方式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认为，影片《春梦》中的人物并没有通过清晰的自我表述、情节性的转折或社会角色的改变来确认自身位置，相反，他们在反复出现的日常行动中如艺璃和三位男性同时照顾瘫痪等父亲、维持彼此的关系、避免冲突等，通过各自的回应与责任承担，逐渐形成一种稳定却不被命名的伦理身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伦理关系而非身份认同出发，重新理解张律电影中边缘人物的主体性生成。围绕电影《春梦》，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明确“伦理身份”作为分析概念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路径。通过对影片中核心人物的文本分析，考察伦理身份在具体关系实践中的生成过程。最后结合影片的影像叙事方式，分析去戏剧化影像如何呈现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与伦理存在。

## 2. 伦理身份的理论基础与分析视角

当代文学与电影批评中，身份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认同分析，而逐渐转向更具动态性的生成结构与伦理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自提出以来，便强调文本中价值取向与伦理意义的重要性，为从伦理关系角度理解人物身份提供了理论基础。<sup>7)</sup>在其术语体系中，“伦理身份”与伦理意识、伦理秩序、伦理禁忌、伦理混乱、伦理环境等概念共同构成理解人物伦理处境的重要范畴。<sup>8)</sup>其中，“伦理身份”尤其适合于分析人物在具体关系中的责任承担、身份确认与伦理困境，因为文学文本中的伦理冲突往往并非单纯来自外部事件，而是源于人物伦理身份的确认、错位或改变。<sup>9)</sup>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并非单纯的审美文本或意识形态反映，而是人类面对生活、他者与道德困境时所形成的伦理表达。<sup>10)</sup>在这一视角下，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身份改变极易引发伦理混乱。<sup>11)</sup>文学作品也常常通过描写人物在伦理混乱中的自我选择，呈现其身份问题的解决或重构。<sup>12)</sup>据此，本文将“伦理身份”理解为人物在伦理关系中通过行为选择、责任承担与他者回应而被建构和确认的存在位置，其背后承载着人物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与义务。

在电影文本中，伦理身份并不一定通过人物的语言宣言或戏剧性选择直接呈现，而往往体现为困境中的道德回应、沉默的在场、克制的选择与具体行动。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调的“回到伦理现场”，也要求研究者将人物行为放回其所处的伦理语境与关系压力中理解，而不是以外在道德标准简单评判人物。<sup>13)</sup>

7) 苏晖, <学术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建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十五年发展历程回顾>, 《外国文学研究》第五期, 2019, 34-51页.

8) 聂珍钊, 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89页. (pdf版本)

9) 同上书, 16页.

10)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 2010, 12-22页.

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63页.

1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这一点与张律电影中的边缘人物形象具有较强契合性。张律电影中的人物常处于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并非只是文化异质者或身份漂泊者，而是在异地生活、沉默共处和责任回应中逐渐建立其“伦理性的自我”。其作品所呈现的边缘性与他的人文主义追求<sup>14)</sup>，也为从伦理身份角度分析《春梦》提供了重要参照。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春梦》中的伦理问题理解为一种在日常关系中持续展开的伦理存在形态，而非通过戏剧性情节或决定性行为一次性完成的伦理选择。已有研究指出，张律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往往建立在沉默与日常共处之上，人物之间虽然难以通过语言充分沟通，却通过共同生活、劳动与身体行动维系关系，这使沉默本身成为伦理关系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sup>15)</sup>因此，影片中人物的伦理主体性并非预先完成，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逐步生成。<sup>16)</sup>

在《春梦》中，这种去情节化的叙事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影片并未通过戏剧性冲突或价值裁决推进叙事，而是将人物关系并置于酒馆、住处、街道等日常空间之中，使意义更多以经验呈现的方式展开。<sup>17)</sup>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人物的伦理状态无法通过某一决定性时刻被确认，而是在日常交往、沉默陪伴、关系维持与责任承担中逐渐显现。由此，本文将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在人物关系层面，考察艺璃、益准、庭凡、钟彬与珠英如何通过照料、拒绝、克制与陪伴生成伦理身份。其次在影像表达层面，分析黑白影像、长镜头、空镜头与空间构图如何使这种伦理关系被观看和感知。通过人物关系与影像形式的结合，本文旨在揭示《春梦》中伦理身份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的独特呈现方式。

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导言7页。

14) 유진월, 「장률의 영화에 나타난 타자의 윤리학」, 『디아스포라 연구』, 제7권 2호, 2013, 51-73쪽.

15) 옥상호, 「침묵과 부재: 장률 영화 속의 디아스포라」, 『한국콘텐츠학회논문지』, 제9권 11호, 2009, 163-174쪽.

16) 유진월, 「장률의 영화에 나타난 타자의 윤리학」, 『디아스포라 연구』, 제7권 2호, 2013, 51-73쪽.

17) 孙炜峰, <游荡者、幽灵影像与流动的现代性：张律电影的文本分析>, 《当代电影》第五期, 2024, 70-75页.

### 3. 《春梦》中核心人物的伦理身份建构

#### 1) 艺璃：责任承担与伦理身份的形成

在《春梦》中，人物的伦理身份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关系、社群归属与他人认同会影响个体的伦理认知和行为方式<sup>18)</sup>，因此人物并不只是通过社会身份被确认，而是在与他人的持续共处中形成伦理位置。张律电影中的人物虽常呈现出近似家庭的共同生活状态，却刻意回避稳定的身份整合<sup>19)</sup>，使人物始终停留在关系之中，而不进入明确的社会身份位置。这种悬置状态可被理解为一种“浮动性”：人物并不通过主动行动彻底改变处境，而是在等待、忍耐、沉默陪伴与关系维持中延续生活。由此，《春梦》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并非决定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日常关系中持续生成的伦理存在形态。<sup>20)</sup>

张律电影中的主体常以“游荡者”形态出现，其行动并不指向目标的完成或身份的确立，而是呈现出反复返回、始终悬置的状态。<sup>21)</sup>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艺璃身上。作为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异乡女性，艺璃来到韩国寻找父亲，却最终成为瘫痪父亲的照料者，并在经营“故乡酒馆”的日常生活中与三位边缘男性建立起复杂关系。然而，与传统叙事中强调异乡者文化冲突或同化困境的描写不同，艺璃从未主动诉说自己的伤痛或表达自我认同的焦虑，相反，她在与周围三位边缘男性的关系交往中，逐渐构建起了一个流动、具体、具有伦理意义的位置。艺璃对父亲的照顾并不是源于制度定义的“孝”，也并非文化遗产的角色义务，而是在具体交往情境中，一种无法回避的身体性、情感性责任的承担。

18) 费婕，〈《蝌蚪吟唱的地方》中的身份伦理建构〉，《枣庄学院学报》第4期，2023，9-14页。

19) 옥상효, 「침묵과 부재: 장률 영화 속의 디아스포라」, 『한국콘텐츠학회논문지』, 제9권 11호, 2009, 163-174쪽.

20) 同上文。

21) 孙炜峰，〈游荡者、幽灵影像与流动的现时代性：张律电影的文本分析〉，《当代电影》第五期，2024，70-75页。

艺璃、益准、庭凡与钟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在一起”的状态中获得伦理意义。艺璃能够继续照料父亲，益准得以暂时脱离犯罪组织，庭凡讨回工资，钟彬在癫痫发作时获得救助，都与这一松散共同体内部的相互回应有关。<sup>22)</sup>由此，《春梦》并不是单纯呈现个体伦理身份，而是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度挖掘<sup>23)</sup>，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扶持，展现个体伦理身份与群体伦理关系之间的生成过程。

伦理身份可以涉及血亲、伦理关系、道德规范、集体社会关系与职业角色等多重维度。<sup>24)</sup>正因如此，在《春梦》中，艺璃、益准、庭凡、钟彬与珠英的伦理身份并不来自单一制度角色，而是在彼此牵绊、关心、照料与回应中生成。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建构自我，而是在与他者的反复互动中使得每个人都在现实处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身份”。《春梦》中的人物并未形成以共同目标或稳定价值为基础的制度性共同体，而是在共同生活、彼此陪伴和最低限度的责任回应中维持一种松散的边缘伦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要求人物完成身份整合，而是搭建起一个“不起作用的社区”<sup>25)</sup>，使他们在“在一起”的状态中获得暂时的伦理位置。艺璃作为这个团体的中心，并不通过文化宣言或语言标识来标榜自我认同，而是通过在“关系中被认出”来完成伦理层面的身份确立。例如，艺璃并非一个以言说方式主张自身存在的主体，而是在被他人需要、被他人期待、被他人依赖的关系中，以“伦理行动者”的姿态完成了对身份的确立。她不主动定义自己，却在被他人需要、期待与依赖的过程中获得伦理存在感。正是在这种具体交往中，艺璃生成了一种超越族裔、性别与阶层标签的伦理身份。

如果说艺璃在与三位男性的关系互动中确立了自身的伦理位置，那么她在面对父亲病重、生活压力骤增的情境中所展现出的沉默承担，则进一步构建了其“伦理身份”的核心维度。作为一位因寻找亲生父亲来到韩国的异乡人，艺璃所

22) 한귀은, 「장률 영화에 나타난 윤리적 아포리아와 무위의 공동체」, 『어문학』, 제 138호, 2017, 393-419쪽.

23) 同上文.

2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63-264页.

25) 한귀은, 「장률 영화에 나타난 윤리적 아포리아와 무위의 공동체」, 『어문학』, 제 138호, 2017, 393-419쪽.

面对的并非团圆的温情，而是父亲因瘫痪而彻底失能的事实。然而，她并未像传统悲情叙事中的女性角色那样控诉命运、表达怨怼，也没有选择离开或逃避，而是默默接受现实，租住在不大的空间内，一边经营酒馆，一边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艺璃所处的照料父亲、经营酒馆与回应三位男性情感依赖的多重处境，构成了影片中最核心的伦理现场。她拒绝三位男性超越友情的追求，却又在生活中给予陪伴与关怀，这种克制并非冷漠，而是对非恋爱关系中的情感责任与关系边界的同时承担。由此，艺璃的伦理身份并不是由“女儿”“异乡人”或“被追求者”等标签决定，而是在持续照料、沉默陪伴与边界维持中逐渐形成。

## 2) 益准、庭凡、钟彬、珠英：边缘人物的伦理回应与身份边界

与艺璃不同，围绕她身边的其他人物也在各自的伦理困境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回应”与“身份生成”。他们虽各具缺陷与边缘性，却并非完全失去伦理行动能力的“失败者”。伦理身份的背后承载着人物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sup>26)</sup>，益准所面临的伦理处境并非源于责任过载，而是来自一种持续的伦理混乱环境。成长于孤儿院、长期游走于社会边缘的经历，使他始终暴露在暴力、非法劳动与性剥削等失序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一环境中，益准并不具备进入主流社会伦理秩序的现实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丧失了伦理行动的能力。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益准的伦理身份并非通过积极的道德宣示或价值主张确立，而是在对“我不是谁”的反复确认中逐渐成形。他拒绝重新回到黑帮组织，亦在被胁迫从事色情场所接待工作时坚守底线，这些行为并非英雄式的反抗，而是一种对伦理越界的持续拒绝。在伦理混乱的现实中，正是这种拒绝构成了他最低限度的伦理界限。

这种伦理界限同样体现在他对日常秩序的细微维护之中。益准坚持为买菜

26)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69页。(pdf版本)

付款、拾起老人掉落物品、以友善态度对待流动小贩，这些琐碎而不显眼的行为，在张律的影像中被反复呈现，并不指向某种社会角色的认同，而是一种对“非流氓”“负责任”的伦理自我建构。这些日常行为并非道德表演，而是益准在伦理混乱中维系自我边界的具体实践。他并非天然善良的人物，而是在现实压力下通过不越过关键伦理边界，保留作为伦理主体的最低尊严。因此，他对艺璃的依附也并非单纯的爱情渴望，而是在陪伴与照料中获得“被需要”的伦理位置。

钟彬因癫痫症长期游离于社会视线之外，尽管作为艺璃的房东，却并未占据任何现实或象征性的“主导”位置。在共同生活的关系中，他更常被视为一个沉默、笨拙、甚至略显可笑的存在。然而，正是在这种被忽视与被轻视的处境中，钟彬的伦理身份得以显现。与益准或庭凡不同，钟彬的伦理回应并不通过语言表达或主动决断完成，而是体现为一种内在而持续的自我约束。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日常生活中推动人物行动的因素并不总是理性，欲望同样构成人物行为的重要动力。<sup>27)</sup>钟彬并非没有欲望，帮助庭凡讨回工资时，他确实带有接近艺璃的私心，但影片的重要之处在于，这种欲望并未转化为对艺璃的占有或侵犯。钟彬并未利用房东身份对艺璃施加任何经济或关系上的压力，他从不随意涨房租，也不通过权力位置索取回报。这些看似消极、不显眼的行为，实则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秩序的自觉维护。因此，钟彬并非边缘关系中的被动依附者，而是通过不越过伦理底线，维持了自身作为伦理主体的最低尊严。

庭凡作为脱北者，其身份处于制度性排斥与社会性压迫的双重边缘。长期处于非法身份状态，使他在影片中呈现出沉默寡言、面容冷峻的姿态，但这种沉默并非冷漠，而是一种出于生存需要而形成的防御性伦理姿态。庭凡的伦理身份并非通过明确道德表态确立，而是在不安全处境中通过谨慎维护关系边界而被确认。在讨薪失败后，庭凡并未寻求法律途径为自己发声，也没有将愤怒转向周围的人。他选择隐忍苟活，却并未因此放弃对伦理关系的基本尊重。他继续与益准、钟彬保持日常交往，不因自身处境而制造冲突，也不通过情绪宣泄破坏既有关系结构。在与艺璃的交往中，庭凡始终保持分寸。他从不以脱北

27) 同上书，203页。(pdf版本)

者或困顿者的身份博取同情，也不将自身苦难转化为道德资本。为艺璃擦拭眼镜、接过她递来的水杯、默默陪同她前往地铁站等细微行动，呈现出庭凡在沉默中完成的伦理回应。这些行为并不指向戏剧性救赎，而是在日常互动中确认其作为伦理主体的位置：即使处于极端边缘处境，他仍选择尊重他者、维持关系秩序。

相比之下，珠英的角色在伦理层面具有特殊地位。珠英作为影片中公开的性少数角色，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却并未被塑造成被凝视或被同情的对象。她以相对自由、清醒的旁观者姿态，补充了影片中边缘伦理共同体的另一种面貌。作为影片中唯一公开的性少数群体，她并未处于主角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之中，而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保留了某种超脱性与自由感。她是影片中最接近“正常人”的存在。拥有健康的身体、清晰的表达与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奏。然而，她的同性恋身份让她在主流社会与艺璃所处的边缘空间之间划出一道不可见的界线。她会踢球、写诗，偶尔出手相助，但这些行为并未让她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正因如此，她与艺璃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性别与身份的情感连接，一种基于“理解”与“尊重”的伦理关系。珠英提出“离开这个地方”的愿望被艺璃视为天真，正因艺璃在伦理责任中被过度捆绑，而珠英在伦理边界中获得了某种解放。这种差异恰恰说明，在边缘社会中，“自由”本身也需要承担其代价。珠英与艺璃形成了不同的伦理承担方式：艺璃是在责任中维系关系，珠英则是在不被完全认同的身份中保持自由与距离。她踢球、骑摩托等日常行为，削弱了主流叙事对性少数群体的特殊化标签，使其以普通生活者的姿态进入边缘共同体。

这样的角色扮演与自我遮蔽，使主体在社会关系中不断偏离真实自我，并进一步加深其精神上的漂泊与失根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以对抗的方式在游牧的城市和空间中建立情感定居的家园，作为对自己被连根拔起的力量替代。这就归结为，通过亲密和相互连结重建精神家园，是对情感家园的恢复和发现。<sup>28)</sup>这些边缘人物并未形成制度性的共同体，却在彼此的回应中维持了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秩序。正是在这一秩序中，他们得以暂时跨越社会身份的

28) 同上书，149页。(pdf版本)

失败经验，获得作为伦理主体的存在位置。<sup>29)</sup>由此可见，《春梦》中的伦理身份与边缘共同体并非单向因果关系。人物并不是先拥有完整的伦理身份之后才组成共同体，也不是完全依赖共同体才获得身份，而是在日常共处、责任回应与边界维持中相互生成。艺璃的照料、益准的拒绝越界、庭凡的沉默克制、钟彬的自我规约以及珠英的自由承担，共同维持了这一松散的边缘伦理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也使每个人物的伦理身份变得可见。

#### 4. 《春梦》中伦理身份关系的影像呈现

##### 1) 沉默与画面镜头中的伦理在场

在《春梦》中，张律通过去戏剧化叙事与节制的影像语言，构建出以沉默、观看和时间延展为核心的伦理表达空间。伦理不再通过对白、情节推进或人物宣言被明确提出，而是在镜头持续观看中被确认。首先，影片中大量的沉默并非意义的缺席，而是伦理身份得以显现的重要媒介。通过镜头和剪辑风格，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明显。张律的电影主要由长镜头和静态镜头组成。<sup>30)</sup>影片中存在的大量长镜头的内容，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记录着发生的一切，给予人物行动的时间，缓慢的节奏来回应各自的伦理身份。

影像不只是叙事工具，也成为伦理关系可视化的重要方式。艺璃照料瘫痪父亲的段落尤为典型，无论是为父亲洗澡、喂水，还是夜间翻身的重复行为，镜头始终保持冷静而稳定的距离，不辅以煽情音乐，也不提供任何情绪提示。在为父亲洗澡的画面中，艺璃前倾的身体与包裹式姿态形成“支撑—依偎”的肢体

29) 문관규, 「장률 영화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의 고향 찾기와 데칼코마니 미학」, 『영화 연구』, 제83호, 2020, 77-106쪽.

30) 김무규, 「장률 영화 연구의 쟁점과 영화 <경주>의 공간」, 『영상문화』, 제17권, 2014, 9-23쪽.

关系，直接呈现其照料者身份。父亲不配合后，现实中的艺璃与镜中影像形成对称，镜像如同她的责任自我，与疲惫、恼火的现实自我构成对峙，外化了她在责任与抵触之间的伦理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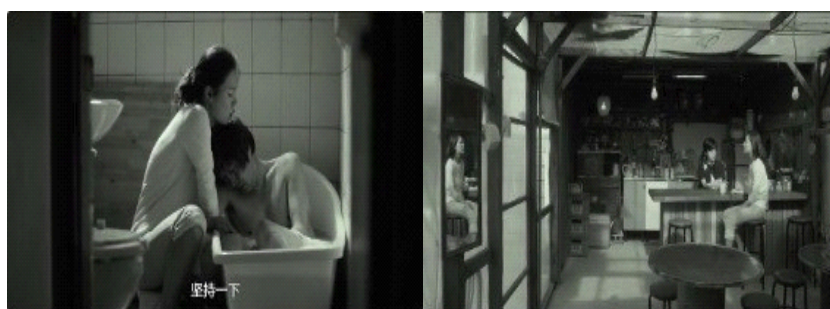


图 1. 艺璃为瘫痪的父亲洗澡的场面

图 2. 艺璃因父亲不配合洗澡后暂时回到酒馆

艺璃从小在缺失父亲角色的家庭中长大，后面来到韩国寻找父亲，她在家庭和社会空间中都发生了身份位移，身份建构过程伴随着剧烈的认知震颤。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不能提供双向的交流和情感依存，她必须重新编码以缔造不同于寻常家庭伦理和社会文化的身份。<sup>31)</sup>在艺璃与父亲共处的空间中，小酒馆的狭小、卧室的昏暗、白天黑夜的照料，这些空间构图既表达了她生活的压迫与封闭，也形成了她伦理存在的物理空间。在这些被限定的空间中，身体是唯一语言，关系是唯一的线索，沉默是最真实的叙述。从镜头景别的使用来看，张律通过全景、中景与近景的反复调度，呈现人物在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差异。全景镜头常用于展现人物共处的状态，使个体不再成为叙事中心，而被置于关系网络之中。中景与中近景则频繁捕捉人物在沉默中的身体姿态与行动细节，使伦理身份不通过语言而通过行为被感知。这种景别上的克制处理，避免了对人物心理的过度进入，也拒绝将伦理简化为情绪表达，从而保持了伦理关系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

31) 费婕，〈《蝌蚪吟唱的地方》中的身份伦理建构〉，《枣庄学院学报》第4期，2023，9-14页。



图 3. 全景镜头下人物的身份关系



图 4. 中近景下艺璃游荡式的行走在街道中的场面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空镜头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伦理在场的结构。空镜头并不承担情节推进功能，而是在人物离开之后，继续停留于空间之中，城市中过往的地铁、静止的街道、高压电线区域。这些画面并非叙事间隙，而是对人物伦理行动的延伸与回响。正是在人物暂时缺席的画面中，伦理关系并未消失，反而以“留白”的形式持续存在。空镜头保留的时间，使伦理身份从个体行动延伸为空间中的关系状态。沉默、空镜头与不同景别的组合，使伦理不以判断结果出现，而以持续被观看、被感知的关系状态存在。人物是否停留、是否离开、是否继续承担，构成了影像中最为重要的伦理判断依据。在这一意义上，伦理身份并不是被叙事确认的结果，而是在镜头所构建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被不断生成与维持的存在。



图 5. 夜幕下地铁的空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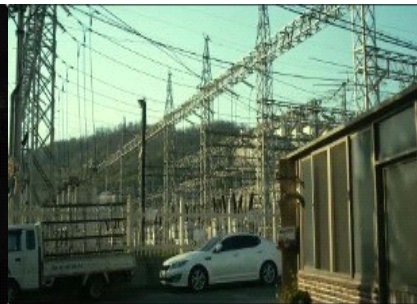


图 6. 影片最后高压电线区域的空镜头

轮椅空镜头以艺璃生活场域中的坡路为载体，将父亲行动依附的工具转化为其照料责任的具象符号。无人推动却沿坡下滑的轮椅，隐喻艺璃对责任失控和亲缘关系脱离的潜在焦虑。与之相对，艺璃家中墙面的长白山天池画像，则成为其身份双重性的视觉锚点。作为朝鲜民族地域与文化认同的象征，它被置于艺璃简朴、边缘的生活空间中，形成宏大文化符号与现实生存处境之间的反差。



图 7. 艺璃做梦时父亲的轮椅从坡上滑下的空镜头



图 8. 艺璃家挂着长白山天池画像的空镜头

## 2) 画面色彩及空间构图中的伦理位置

《春梦》全片以黑白影像呈现，这种去色彩化的视觉策略并非单纯的风格选择，而是一种伦理表达方式。这种去色彩化处理不仅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也将人物从日常的现实描述中抽离出来，使观众更加聚焦于人物的行动本身而非情节的起伏。通过这种黑白摄影所带来的“疏离”与“凝视”，让伦理关系从情节性的解释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视觉化、节奏化的沉思经验。黑白影像削弱了现实的感官诱惑，使人物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抽离出来，观众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与行动节奏之上。在这一影像语境中，伦理不再通过语言被确认，而是在沉默、共处与身体行为中被持续生成。张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消解了电影媒介所固有的语音中心主义。<sup>32)</sup>正因如此，影片中

人物的伦理位置并非由身份标签或情感宣言决定，而是通过画面中的空间关系被不断标示。艺璃在黑白影像中，始终处于关系网络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在酒屋的聚会场景，还是在照料父亲的私密空间中，她都并非通过言说确立自身存在，而是在空间中被他者围绕、被关系需要，从而成为伦理关系得以运转的核心节点。



图 9. 四人谈话时的位置关系



图 10. 四人在地下隧道内的位置关系



图 11. 四人拍照的位置关系

然而，在影片结尾，随着艺璃的去世，影像突然转为彩色，这一突变并非

32) 마셀 사옹, 윤경진 역, 『오디오-비전』, 한나래, 2003, 19-20쪽; 转引自육상호, 「침묵과 부재: 장률 영화 속의 디아스포라」, 『한국콘텐츠학회논문지』, 제9권 11호, 2009, 163-174쪽.

象征现实的回归或情感的解放，而是标志着伦理结构的断裂。艺璃的遗照以特写镜头呈现，她的形象被固定在静止的画框之中，从行动者转变为被观看的对象。此时，艺璃已不再处于伦理关系之中，而是被移置为记忆与悼念的符号，其伦理身份也随之终止。紧接着出现的酒屋场景中，缺少了艺璃的三位男性并排坐于圆桌旁，画面同样转为彩色。尽管人物依然共处于同一空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构成一个有效的伦理共同体，尽管在影片结尾益准还是喊着钟彬一起去寻找庭凡，但作为本是伦理的中心人物的艺璃，是她将日常空间变成一个特殊的地方，将其变成一个家庭，而作为“母亲”角色<sup>33)</sup>的艺璃离开后，这样的伦理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彩色影像在此并未带来情感的充盈，反而强化了空间的空洞感，桌面依旧、酒具齐备，但关系的中心已经消失。艺璃曾经占据的伦理位置无法被他人替代，画面中的彩色反而凸显出一种失去伦理支点后的漂浮状态。因此影片《春梦》中色彩的变化并不是单纯是叙事层面的现实转换，是对伦理位置变化的影像标注。黑白影像所承载的是伦理关系仍在运作的时间，而彩色影像则标示着伦理核心缺席之后的世界。在艺璃消失之后，人物依旧存在，空间依旧完整，但伦理关系却不再成立。张律正是通过这种色彩与空间构图的反转，使伦理身份的生成与消失，获得了清晰而克制的影像表达。



图 12. 艺璃去世后遗照的特写



图 13. 缺少了艺璃画面变为彩色

33) 문관규, 「장를 영화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의 고향 찾기와 데칼코마니 미학」, 『영화 연구』, 제83호, 2020, 77-106쪽.

艺璃与父亲的伦理关系，并非以稳定的亲情纽带或明确的责任宣言呈现，而是在一次几乎被中断的关系瞬间中，通过影像完成其伦理身份的重新确认。伦理包含两个内在的准则，即互助伦理 (Ethique de solidarite) 和责任伦理 (Ethique de la responsabilite)”。<sup>34)</sup>很明显，艺璃与父亲的伦理准则更符合后者。影片中，艺璃曾一度向父亲坦露过想要抛弃他的念头，这一言语并未被导演处理为戏剧性的道德冲突，而是被迅速收束进一个由停顿、沉默与空间构图所构成的伦理场面之中。当父亲在轮椅上缓慢而艰难地说出“只有你一个女儿”这句话时，影片并未通过近距离的情感特写或音乐强化来引导观众的同情，而是以克制的构图与延宕的时间处理，使这一伦理唤认在画面中缓慢生效。艺璃的身体在此刻发生了明显的停顿。她并未立刻回应，也未转身离开，而是在父亲与自己之间形成了一段被拉长的沉默。这一停顿并非心理犹豫的简单再现，而是伦理身份被重新安置的瞬间。在这一场面中，人物借助画面中时间的延宕与身体姿态的变化，使伦理身份以影像的方式被看见。艺璃是否会抛弃父亲，并不是一个由意志决定的结果，而是在父亲的言语唤认与画面停顿所构成的伦理现场中，被重新安置的位置。正是在这一刻，伦理身份不再是可以协商或逃离的选择，而成为一种无法被忽视的存在状态。



图 14. 艺璃与父亲在树林中谈话的场面

34) 埃德加·莫兰著，于硕译，《伦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14页。

区别于艺璃与父亲关系中逐步完成的伦理身份确认，庭凡与前女友的重逢场景，则呈现出一种伦理身份被明确拒绝的过程。两人同为脱北者，共享相似的身份背景与生存处境，但影片并未将这一“共同身份”转化为必然的伦理责任。在酒馆内的对话场景中，庭凡与前女友的身体位置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结构。前女友主动靠近、身体前倾，试图通过情感回忆与共同出身唤起庭凡的责任感。庭凡却始终保持低头、回避视线的姿态。这种构图并非简单的情感冷漠，而是通过空间距离与视线断裂，表现出庭凡对“前伴侣”和“共同出逃者”这一伦理身份的拒绝。当两人移至更为开阔的空间，影片采用全景镜头，将他们置于同一画面却彼此分离的位置之中。在伦理社会中，关系是最典型的连接方式，社群归属感则是自我与他人产生联结的核心纽带，而社会认同的核心往往源于群体内的他人认同，个体所属的各类关系会直接塑造其伦理认知与行为逻辑。

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就曾指出，地方和社群所孕育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不仅能促成内部的睦邻互助与情感凝聚，其强烈的边界感也可能对外形成排他性”。<sup>35)</sup>这说明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个体伦理身份的重要坐标，它会推动个体的归属感，做出符合共同体伦理期待的行为选择。而前女友试图请求庭凡陪同她与现任男友一同前往美国，这一请求并非单纯的情感诉求，而是对庭凡承担“共同体成员”伦理身份的召唤。然而，庭凡并未以语言拒绝，而是通过沉默、停顿与拒绝，划定了自身的伦理边界。庭凡的选择并非逃避责任，而是在极端边缘处境中，对自身伦理承受能力的现实判断。他拒绝再次进入一段可能导致更大伦理混乱的关系结构，实际上是在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秩序。影片通过全景构图，将这一拒绝呈现为一种空间上的“无法靠近”，使伦理身份的缺席成为可见的影像事实。

35) 段义孚著，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7页。



图 15. 庭凡前女友来到酒馆挽留庭凡的画面



图 16. 酒馆内的人物的位置关系画面

## 5. 结论

影片《春梦》以高度去戏剧化的影像风格与对边缘人物群体的关注，呈现出当代影像叙事中伦理身份生成的另一种可能性。影片并未通过明确的情节冲突、道德判断或身份宣言来塑造人物，而是将伦理置于日常关系与具体行动之中，使人物的伦理身份在沉默、陪伴与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逐步显现。通过对艺璃、益准、庭凡、钟彬与珠英五位角色的分析，本文尝试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身份叙事的视角出发，揭示《春梦》如何在非稳定社会结构与临时关系网络中，呈现伦理身份的生成机制。

人的社会身份指个体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sup>36)</sup>然而《春梦》所呈现的恰恰是一种社会身份难以被确认的生存状态。在漂泊过程中，无论是艺璃与庭凡的民族身份，还是益准、钟彬与珠英的社会身份，都未能获得主流社会的有效承认，他们不仅无法真正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也难以获得基本的尊重，并因此承受多重现实压力。建立在这种身份失认基础上的人物关系，也就不再遵循传统叙事中清晰的身份定位与情感归

36) 莫里茨·石里克，孙美堂译，《伦理学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转引自肖丹，《群山回唱》的文学伦理学解读，齐齐哈尔大学，2015，24页。

属逻辑。相反，影片有意营造出一种介于亲密与疏离之间的伦理关系场域：艺璃既不是被凝视的欲望对象，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牺牲者，而是在与三位男性的持续共处中，通过拒绝明确承诺与情感占有，维持了一种克制而稳定的伦理在场。”这种关系并非建立在制度性身份或情感契约之上，而是在共同生活与日常回应中生成，呈现出张律电影中独有的伦理关系形态。

在伦理身份的生成路径上，本文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观点，强调伦理身份并非先验角色或社会标签，而是在具体伦理现场中，通过对他者的回应与责任承担逐步形成。艺璃的照料责任、益准的伦理边界、庭凡的沉默克制、钟彬的自我约束以及珠英对身体自由与关系距离的坚持，均体现出不同形式的伦理回应。这些人物虽处社会边缘、身份模糊，却在具体行动中形成各自的伦理身份，并共同构成一种非制度性的边缘伦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形态可以借助 Turner 的“*communitas*”概念加以理解。Turner 所说的 *communitas* 并非建立在稳定制度、等级结构或共同目标之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在结构边缘或过渡状态中形成的直接人际关系。<sup>37)</sup>由此看来，《春梦》中的边缘人物并不是先获得稳定身份后才进入共同体，而是在共同生活、相互依赖与最低限度的伦理回应中，临时形成一种非制度性的伦理共同体。最后在影像呈现策略上，张律通过静态镜头、长镜头、空镜头与空间留白等方式，将伦理身份的生成过程影像化。影片中的沉默并非情感缺失，而是伦理关系展开的空间。黑白影像、长镜头、空镜头与空间构图，使观众能够从身体位置、关系距离与时间延宕中感知人物的伦理位置。影像在此不仅是叙事工具，也是一种拒绝评判、拒绝煽情的伦理姿态。

综上所述，《春梦》通过对边缘人物群体的细腻描绘，以去戏剧化影像语言呈现“沉默中的伦理”，使伦理不再表现为价值判断的结果，而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关系状态。相较于《庆州》《群山》等更强调空间游荡、记忆追寻与地方经验的作品，《春梦》的独特性在于，它更集中地将伦理身份置于照料、陪伴

37)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69, pp. 96-97.

和日常共处之中加以呈现。本文由此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为理解张律电影中的人物建构与影像伦理提供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书籍：

- 埃德加·莫兰著，于硕译，《伦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
- 段义孚著，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pdf版本）

论文：

- 김무규, 「장률 영화 연구의 쟁점과 영화 <경주>의 공간」, 『영상문화』, 제17권, 2014.
- 문관규, 「장률 영화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의 고향 찾기와 데칼코마니 미학」, 『영화연구』, 제83호, 2020.
- 유진월, 「장률의 영화에 나타난 타자의 윤리학」, 『디아스포라 연구』, 제7권 2호, 2013.
- 육상호, 「침묵과 부재: 장률 영화 속의 디아스포라」, 『한국콘텐츠학회논문지』, 제9권 11호, 2009.
- 한귀은, 「장률 영화에 나타난 윤리적 아포리아와 무위의 공동체」, 『어문학』, 제138호, 2017.
- 陈芊含，汪云霞，〈伦理选择与文化身份认同—《汉尼拔》小说与影视的文本对比研究〉，《社会科学动态》第四期，2024。
- 费婕，〈《蝲蛄吟唱的地方》中的身份伦理建构〉，《枣庄学院学报》第4期，2023。
- 苏晖，〈学术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十五年发展历程回顾〉，《外国文学研究》第五期，201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2010。
- 玛丽·莫兰，宁艺阳，陈后亮译，〈身份和身份政治：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国

外理论动态》，2019.

孙炜峰，〈游荡者、幽灵影像与流动的现代性：张律电影的文本分析〉，《当代电影》第五期，2024.

向玉乔，卢明涛，〈论身份伦理〉，《伦理学研究》第四期，2023.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69.

学士论文：

窦立春，身份的伦理认同，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16.

肖丹，《群山回唱》的文学伦理学解读，齐齐哈尔大学，2015.

## Abstract

### A Study on Ethical Identity in Zhang Lü's Films — A Case Study of A Quiet Dream

Wang Jiawei

This study takes Zhang Lü's film *A Quiet Dream* as its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hip,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ethical identity" from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 attempt to move beyond existing approaches that mainly interpret Zhang Lü's films in terms of ethnic identity, diasporic experience, transna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Instead, the study shifts its analytical focus to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ethical positions within concrete relational practices. It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s in *A Quiet Dream* do not establish their sense of self through explicit identity declarations, dramatic plot turns, or institutional confirmation; rather, they gradually form a stable yet unnamed ethical identity through everyday actions such as silence, companionship, caregiving, restraint, and the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film text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then examines the major characters—Yili, Ik-jun, Jeong-beom, Jong-bin, and Joo-young—to analyze how they construct ethical responses and identities through marginal situ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reb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 non-institutional "marginal ethical community" is formed in the film. Finally, by combining character analysis with the film's audiovisual expression, the study explores how black-and-white cinematography, long takes, static shots, empty shots, spatial composition, and silent narration jointly render ethical relations visib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rough its de-dramatized narrative strategy and restrained visual language, *A Quiet Dream* transforms ethics from a matter of value judgment into an enduring relational state. In doing so, it not only presents the ethical mode of existence of marginal figur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but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aracter construction and visual ethics in Zhang Lü's cinema.

**Key words** : Zhang Lü; A Quiet Dream;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arginal characters; cinematic narra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투 고 일 : 2026. 4. 10. / 심 사 일 : 2026. 4. 15. ~ 2026.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5. 20.